德国政党智库：以政治教育为核心使命

陈瑜*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北京　100017）

摘要：[目的/意义]德国政党智库在国际上一直享有盛誉。对德国政党智库的使命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能够为我国同类型智库的建设提供借鉴、启示与支持。[方法/过程]本文基于国外研究资料特别是德文资料，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等方法，多角度地探索了德国政党智库的使命问题。[结果/结论]不同于以政策咨询见长的美国智库，德国政党智库以政治教育为核心使命。他们是20、21世纪的“传教士”，孜孜不倦地在全球各地传播西方特别是德国的政治话语。他们弘宣的核心“教义”是西方民主。

关键词：德国政治；政党智库；政治基金会；政党基金会；决策咨询制度；政治教育；外交；功能让渡

分类号：D73/77

German Partisan Think Tanks: Taking Political Education as the Core Mission

Chen Yu
(Institute of Party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Beijing　100017, China)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German partisan think tanks have always enjoyed a high reputation in the world. A thematic study on the mission of German partisan think tanks can provide reference, inspiration and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imilar think tanks in China. [**Method/process**] Based on foreign research materials, especially German material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ission of German partisan think tank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by using literature research,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other methods. [**Result/conclusion**] Unlike American think tanks that specialize in policy consultation, German partisan think tanks take political education as its core mission. They are the "missionaries" of the 20th and 21st centuries, who tirelessly spread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the West, especially Germany, around the world. The core doctrine they propagate is Western democracy.

Keywords: German politics; partisan think tanks; political foundation; political party foundation; a consultative policy system; political education; diplomacy; function transfer; transfer of function

---

*E-mail：thestrategist@sohu.com。

德国政党智库在国际上一直享有盛誉。遗憾的是，近年来，我国一些学者有意无意地误读德国政党智库，聚焦放大“政策咨询”，浓墨重彩“公共外交”，轻描淡写“政治教育”，误导了公众和决策者，殊为不妥。

本文将努力展现德国政党智库的真实面貌。在研究中，作者将尽可能地采用最新、一手、权威的德文资料。

1　德国政党智库的概况

德国政党智库已经经历了近百年风雨的洗礼。在我国，人们熟知的德国政党智库主要有以下六家。

艾伯特基金会。艾伯特基金会是德国第一家政治基金会。1925 年 2 月 28 日，当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去世时，这位坚定的社民党人在遗嘱中下令成立一个基金会（该基金会旨在以民主精神教育社会各界人士，增进德国与其邻国之间的了解，并支持有才华的年轻人。）。次月 2 日，艾伯特基金会在柏林成立。随着艾伯特基金会的成立，德国开始通过政治基金会促进民主。[1]

阿登纳基金会。阿登纳基金会的历史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1955 年 12 月 20 日，一群来自基民盟的人士成立了基督教民主教育工作协会，该协会的定位是一个基于基督教民主信念的教育机构。[2]自 1964 年以来，它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任总理、时任基民盟主席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的名字命名。阿登纳基金会在政治上亲近基民盟，但在财务上和组织上都是独立的。[3]

瑙曼基金会。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是德国重要的自由派先驱。1919 年，瑙曼因中风英年早逝，他的支持者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等继承了他的事业。1958 年 5 月 19 日，瑙曼基金会成立。同年 11 月 14 日，瑙曼基金会举行正式成立仪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时任总统、自民党前主席豪斯出席仪式，并在致词中阐述了瑙曼的精神遗产。豪斯有意将基金会与瑙曼在 1918 年创立的“公民学校”建立联系，并以瑙曼之名命名基金会。瑙曼基金会的初心是成为德国自由主义的知识中心。[4]

赛德尔基金会。1961 年 8 月，曾任巴伐利亚州州长和基社盟主席的汉斯·赛德尔（Hanns Seidel）因病辞世。几个月后，基社盟开始筹划建立一个亲政党的政治基金会。由于赛德尔的政治成就和对政治教育（Politische Bildung）的高度重视，该基金会以他的名字命名。[5]1967 年 4 月 11 日，赛德尔基金会在慕尼黑地区法院的社团登记簿上登记，加入了政治基金会的行列。[6]赛德尔基金会是第一个进入中国的德国政治性基金会。[7]

伯尔基金会。伯尔基金会得名于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被视为“参与政治的典范市民”的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8]伯尔基金会是一家实践绿色愿景的智库，与绿党联系紧密，但独立运作。[9]1997 年 7 月 1 日，伯尔基金会在位于柏林市中心的新总部开始工作。[10]1998 年 3 月 17 日，伯尔基金会首次进入社团登记簿。[11]

卢森堡基金会。该基金会的前身是1990年由志愿者在柏林成立的“社会分析与政治教育”协会。[12]1999年6月25日，该基金会在会员大会上决定命名为“罗莎·卢森堡联邦基金会”。对此，德国联邦政府表示不满。最终，基金会保留了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女）的名字，但放弃了联邦基金会（Bundesstiftung）的头衔。[13]当前，卢森堡基金会代表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潮流，与左翼党关系密切，但在组织上和财务上均独立于该党。[12]

上述六家智库，都是联邦级的政党智库。事实上，在这六家智库之外，德国还有一家新兴的联邦级政党智库：亲近选择党的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基金会（Desiderius-Erasmus-Stiftung，简称DES）。该基金会以人称“鹿特丹的伊拉斯谟”的人文主义泰斗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年）命名，[14]2016年12月10日在法兰克福成立，[15]2018年6月30日在奥格斯堡召开的选择党党代会上被正式确认为选择党的政党基金会。[16]以往，可能是受到德国主流政党和主要政党智库的影响，我国学者普遍忽视了伊拉斯谟基金会。

除了七家联邦级的政党智库，德国还有一些联邦州一级的政党智库。例如，在德国所有的16个联邦州，都有一个亲近绿党的州基金会（Landesstiftungen）。[17]又如，在巴伐利亚州，还有亲近自民党的托马斯·戴勒基金会、亲近社民党的格奥尔格·冯·沃尔玛学院。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则有亲近基民盟的卡尔·阿诺德基金会。[18]

根据德文维基百科，截至2022年6月30日，德国共有7个联邦一级的政党基金会，45个联邦州一级的政党基金会。[19]

上文运用可验证的最新一手资料，勾勒了德国政党智库的大致轮廓，提供了一些有关德国政党智库的准确信息。通过研读这些信息，我们发现：德国政党智库与政治教育渊源颇深。并且，一些政党智库的前身就是政治教育机构。

2　资金问题：对“吃皇粮”的历史回顾

资金是基金会的基本。由于政党智库亲近政党，我们假定，研究政党智库的资金问题，必须放大视野，适度关注政党的资金问题。这是一个不算大胆的假设，下面我们将小心地求证。

2.1　艾伯特基金会早期的艰难岁月

最初，德国政党智库也是颇为资金问题犯愁的。德国第一家政治基金会艾伯特基金会诞生于“20年危机”（Twenty Years' Crisis）[20]时期，是遵照艾伯特的遗嘱创建的，启动资金来自送葬者的捐款。

艾伯特出身寒微。由于自身的苦涩经历，艾伯特产生了成立一个基金会的想法，以使工人阶级的孩子能够通过教育晋升社会阶层。[21]于是，在遗嘱中，艾伯特请求吊唁者以捐款替代葬礼上的鲜花，从而为基金会奠定了财务基础。[22]

从魏玛共和国时期出版的社民党年鉴来看，1925-1933年，艾伯特基金会主要从事学生资助工作，其资金规模和社会影响力都是十分有限的。一方面，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1986年7月14日作出的关于政治基金会的裁决提到，除了提供助学金，早期的艾伯特基金会还与国际联盟的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建立了联系。

助学金并非面向所有社会阶层的学生。《德国社会民主党年鉴 1926》指出："艾伯特基金会致力于为年轻、有能力的无产者提供在国家认可的机构学习课程的助学金。原则上，只支持那些有党组织推荐信的人。"另一方面，助学金是十分微薄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年鉴 1930》显示，在过去的一年里，共有 70 名"有能力的同志们"获得了总计 11300 帝国马克的小额助学金，每人每月的平均金额约为 13.50 帝国马克。1932 年出版的年鉴是社民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出版的最后一本年鉴，其提供的数据更令人失望：1931 年，有 75 名学生得到了资助，然而，他们只获得了 7.015 帝国马克。并且，"基金会的资金在（1931）年底就完全用光了"。[23]

艾伯特基金会指出，到 1931 年底，该基金会共为 295 名学生提供了大约 52000 帝国马克的资助。[1]按今天的人民币计算，这些学生人均获得了约 4647 元-6021 元人民币。这显然不能说是大手笔。

常言道："穷人没有富亲戚。"这一时期，艾伯特基金会尚未独立于社民党。因此，只需看看社民党的艰难处境，就可以理解艾伯特基金会的小打小闹。研究社民党党史和德国工人运动史的社民党人苏姗·米勒（Susanne Miller）、海因里希·波特霍夫（Heinrich Potthoff）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一书中指出，"由于多种原因，社会民主党 1920 年以后的活动范围大大地受到限制"，"影响有限"。并且，这一时期，作为社民党党员主体的工人经常遭受通货膨胀、失业、贫困、饥饿等多重苦难，工会"会员人数骤减"，"财政拮据"。[24]

雪上加霜的是，1933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成为了德国总理。同年 6 月 22 日，社民党被禁止。[24]艾伯特基金会也在劫难逃，于是年被取缔。

2.2 由"再教育"而来的政治教育的兴起与公共资助的政党基金会的涌现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社民党等老牌政党开始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1945 年 4 月，一些社民党人在汉诺威举行会晤，决定重建社民党。[24]之后，1947 年 1 月，在社民党领导层作出决定后，艾伯特基金会重建，并继续从事学生资助工作。[1]

在社民党等传统政党努力重建的同时，一些新的政党也在悄然萌芽。基民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基民盟逐渐成为西德政坛最强大的政党。1949 年 8 月 14 日，在第一届联邦议院选举中，基民盟成为第一大党；次月 15 日，基民盟领袖阿登纳当选为联邦总理，开启了"阿登纳时代"。[25]

正是在阿登纳政府的第一个任期内，西德成立了专门从事政治教育工作的政府机构——德国联邦乡土服务中心，翻开了德国政治教育工作的新篇章。立国之初，西德的政治教育与其说是对本民族以往的政治教育文化的发扬光大，毋宁说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对德国西占区实行的强制性的"再教育"（Reeducation）的萧规曹随。关于"再教育"、政治教育与政党基金会等的历史渊源，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主席托马斯·克鲁格（Thomas Krüger）指出："政治教育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自我形象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再教育'过程中的重点是民主教育时，政治教育中心在联邦和州一级成立了。结果，各种各样的附属教育机构和意识形态不同的教育机构开始从事教育工作。议院中的各政党成立了大型基金会，与涵盖面很广的成人教

1963 年更名为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

育学院网络一起丰富了政治教育领域。这些机构都是由公共资金运营的。”[26]

事实的确如克鲁格所言。1952 年 11 月 25 日，德国联邦乡土服务中心成立，“标志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家政治教育的正式开始”。[27]此后，部分地是在德国联邦乡土服务中心的赞助下，包括宗教组织和工会在内的一系列机构都开始从事政治教育。政党也开始积极参与这项事业。它们除了亲自组织政治教育，还成立了“特殊的政治学院”——政党基金会。[28]

第一个“吃螃蟹”的是社民党。1954 年 4 月 1 日，艾伯特基金会进行了自我改造，成立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促进民主人民教育基金会”。1956 年 2 月 28 日，该组织迎来了其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里程碑：联邦总统豪斯在贝格诺伊施塔特为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资助的家庭成人教育学院（Heimvolkshochschule）揭幕。同时，从 1956 年起，艾伯特基金会独立于社民党，越来越多地由纳税人的资金资助，并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活跃起来。[1]

作为阿登纳时代的执政党，基民盟也紧锣密鼓地成立了政治教育机构。1955 年底，基督教民主教育工作协会成立。次年 1 月，该协会购买了艾希霍兹城堡作为教育设施。经过充分的准备，1957 年 4 月 12 日，时任总理阿登纳为艾希霍兹政治学院隆重揭幕。该学院的使命是“在基督教的基础上促进德国人民的民主和公民教育”。[2]艾希霍兹政治学院构成了 1964 年命名的阿登纳基金会的基础。[28]

紧随其后，1958 年，自民党成立了瑙曼基金会。[4]

和今天相比，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期的德国政党基金会资金规模很小，并且其获得的公共资金也不是很多。其中，20 世纪 50 年代，只有零星的公共资金流向政党基金会。例如，有研究指出，到 1957 年，艾伯特基金会曾利用联邦外交部（AA）的资金与拉丁美洲的工会组织“美洲区域工人组织”合作。[29]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情况发生了变化。1962 年，德国联邦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以微弱的优势通过了从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BMZ）的预算中为政治基金会拨款的决定，相关资金被指定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教育项目。当年，这笔钱只有区区 13 万马克，但对政治基金会来说幸运的是，其后来增长得很快。[28]

2.3 政党融资的受限制与政党基金会的大发展

德国是一个“政党国家”（Parteienstaat）。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西占区于 1949 年 5 月 23 日颁布了《基本法》，首次将政党写入了宪法。[30]德国哈勒（萨勒）社会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埃弗哈德·霍尔特曼（Everhard Holtmann）评价道，1949 年的《基本法》从宪法上承认了政党国家制度，将政党地位提升到宪法机关的高度。尽管如此，霍尔特曼注意到，直到 1954 年，都还不存在从联邦国库向政党支付金钱的做法。[31]然而，变化已经在酝酿了。

此前，1953 年 9 月 6 日，在第二届联邦议院选举中，由基民盟及其姊妹党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一举赢得了超过半数的议席，进一步巩固了优势地位。次月 9 日，阿登纳再度当选为联邦总理，并组建了一个大型的多数党政府。除了社民党之外，德国联邦议院的所有党派都参加了这个政府。[25]显然，此时朝野政治力量的对比十分有利于阿登纳政府。

在“朝大野小”的格局下，阿登纳政府开始了利己损人的“神操作”。从 1954 年开始，德国联邦政府陆续通过了包括 1954 年 12 月 21 日的《所得税法》和《公司税法》、1955 年 12 月 21 日的《所得税实施条例》、1955 年 12 月 23 日的

《公司税实施条例》等在内的一系列联邦法律，这些联邦法律都包含着规定向政党捐款可以享受税收减免的权利的条款。[32]要知道，20 世纪 50 年代，基民盟的经费来源有 90%是依靠捐款，社民党的经费来源则仅有 10%是依靠捐款。[25]因此，上述联邦法律的相关条款明显有利于主要依赖捐款的基民盟等政党，而不利于主要依赖党费的社民党。社民党执政的黑森州政府随即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起了诉讼。

1958 年 6 月 24 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作出裁决，裁定税收优惠违反了《基本法》，指出国家没有确保政党的资金需求得到满足的法律义务，但认为国家为政党的选举活动提供资助是合理的。[32]应该说，该裁决从根本上确认了国家对政党的财政支持的合宪性。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德国政党虽然损失了税收优惠可能激发的一些捐款，但却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国家资助，一失一得之间，可谓是丢了芝麻，捡了西瓜。同时，对于德国政党基金会而言，由于向其捐款可以照常享受税收减免的权利，一些原本可能捐给政党的钱转头扑进了其怀抱，也算是被天上掉下来的芝麻雨砸中了。[28]

随后，在 1959 财政年度的联邦预算中，德国首次从联邦预算资金中向政党提供补贴。根据德国联邦议院预算委员会的提议，使用了 500 万马克，用于“促进政党的政治教育工作的拨款”。关于资金的分配，该委员会在 1960 年 2 月 10 日召开的第 107 次会议上一致决定，资金“应根据其在联邦议院中的实力，分配给在联邦议院有议席的政党”，同时，“各政党应自行负责使用资金”。1960 和 1961 财政年度重复了 1959 财政年度的安排。在 1962 财政年度的联邦预算中，除了 500 万马克的“政治教育工作专项资金”，还编列了 1500 万马克的“根据《基本法》第 21 条规定的政党任务专项资金”。在 1963 财政年度的联邦预算中，“政治教育工作专项资金”被取消，“根据《基本法》第 21 条规定的政党任务专项资金”则由 1500 万马克增加到 2000 万马克。同时，资金的分配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具体来说，20%的资金被平均分配给了在联邦议院有议席的四个政党，80%的资金则是根据实力在这四个政党之间分配的。在 1964 财政年度的联邦预算中，“根据《基本法》第 21 条规定的政党任务专项资金”由 2000 万马克增加到 3800 万马克。1965 和 1966 财政年度重复了 1964 财政年度的安排。[33]

通俗地说，自 1959 财政年度起，德国主流政党就开始打着“政治教育工作”“根据《基本法》第 21 条规定的政党任务”的旗号堂而皇之地从国库往党库搬钱了。政党能不能进国库，取决于其有没有跨过德国联邦议院的“门槛”。政党可以搬多少钱，要看其在德国联邦议院有多少把“交椅”。显而易见，德国联邦议院作出的如此安排，对已经身处联邦议院的政党十分有利，而对那些没能进入联邦议院的政党，尤其是小党和新成立的政党十分不利。

事实上，对于小党和新政党而言，这简直就是往伤口上撒盐——痛上加痛。此前，小党和新政党已经受到了被视为联邦议院“门槛条款”（Sperrklausel）的“5%条款”的沉重打击。由于“5%条款”，小党进入德国联邦议院的难度大大提升了，新政党的建立和发展也变得困难重重。

今天，给议院设置或高或低的“门槛条款”，以及向政党提供或多或少的国家资助，都已经成为国际惯例。但是，20 世纪 50 年代，“门槛条款”还不多见，政党补助更是前所未有。因此，尽管有德国联邦宪法法院 1958 年 6 月 24 日

的裁决背书，但当坐在德国联邦议院里的主流政党坐地分钱时，还是有很多政党表达了不满。并且，反对慷国家之慨给政党发补助的，不仅有小党和新政党，还有百年大党。

和国家一样，政党无往不在对内和对外的“双层博弈”（Two-Level Games）[34]之中。因此，我们看到，虽然社民党能够参与分肥，但其党内却长期存在反对的声音。[35]最终，社民党执政的黑森州政府又一次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递交了诉状。

1966 年 7 月 19 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就政党的融资问题专门作出裁决。关于“政治教育工作专项资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定，鉴于政党的政治教育工作与政党的一般工作不能划清界限，向政党提供用于政治教育工作的预算资金是违宪的。关于“根据《基本法》第 21 条规定的政党任务专项资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定，政党可以从联邦资金中报销适当的联邦议院竞选活动的必要费用，但只有与竞选活动直接相关的实际支出才有资格获得报销，政党维持其常设组织的运行费用和非直接服务于竞选活动的活动费用无法报销。[33]应该说，该裁决彻底断掉了政党以政治教育之名向国家伸手要钱的念想。

《圣经》说：“当上帝关了这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门。”我们看到，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提供给政党的“政治教育工作专项资金”说“不”后，资助政治教育工作的联邦资金掉头向政党基金会涌去。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 1986 年 7 月 14 日就政治基金会问题作出的裁决中指出，自 1967 财政年度起，联邦预算开始为亲政党的基金会提供“全球赠款”（Globalzuschüsse）。1967 年，900 万马克被作为“用于社会政治和民主教育工作的全球赠款”。全球赠款旨在使政党基金会能够扩大和加强其政治教育工作。[36]有研究指出，正是为了获得全球赠款，基社盟才在 1967 年成立了赛德尔基金会[28]。

从 1967 年至今，德国政党基金会获得的公共资金大体保持了稳定增长的势头。2018 年 1 月 23 日，德国联邦政府在答复选择党联邦议院党团的质询时，概述了联邦预算向亲政党的基金会提供的资金的情况。德国联邦政府指出，联邦预算向政治基金会提供的资金的主要用途是社会和民主教育工作、政治研究、信息、咨询和支持资优人才，以及协助在国外建立民主、自由和宪政结构。联邦资金是由联邦外交部、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联邦内政部（BMI）、联邦教育和研究部（BMBF）、联邦劳动和社会事务部（BMAS）等部委分别提供给政治基金会的。随着各部委职责的变化，其提供给政治基金会的资金数额也会发生变化。向政治基金会提供的公共资金包括全球赠款和项目融资（Projektfinanzierungen）。其中，全球赠款是由联邦内政部提供的。此外，德国联邦政府还以附表的形式提供了 1990-2017 年各部委提供给政治基金会的资金名称和数额。[37]

总之，20 世纪 50、60 年代，由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一系列裁决，政党融资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越来越多的政治资金转而流向了政党基金会，为政党基金会数十年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一部分政治资金由政党转向政党基金会的同时，

同时，该裁决大大加快了《政党法》的立法进程。次年，《政党法》正式颁布施行，强化了对政党融资的法律规制。

然而，迟至 1977 年，赛德尔基金会才实现了与其他政党基金会的法律平等，其获得的联邦资金因而大幅增加。此前，赛德尔基金会一直未被德国联邦政府承认为独立的基金会。

又叫项目资金（Projektförderung）。

一些政治功能（例如政治教育、政策研究和民意调查等）也在政党和政党基金会之间发生了让渡。这种现象，作者称为“功能让渡”（Function Transfer, Transfer of Function）现象。学术研究是一个薪火相传的过程。长期担任国际政治学协会政治金融和政治腐败研究委员会主席的英国学者迈克尔·平托-杜欣斯基（Michael Pinto-Duschinsky）早就意识到，根据德国联邦宪法法院1958年的裁决，企业给政党的捐赠不符合免税条件。但是，给政治基金会的商业款项仍然是免税的。因此，通过基金会尽可能多地履行政治功能（例如政策研究和民意调查）是节税的。[28]站在杜欣斯基的肩膀上，我们看到，刺激政党向政党基金会让渡政治功能的，除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1958年的裁决，还有该院1966年的裁决，以及自1967财政年度起提供给政党基金会的全球赠款。简言之，多重刺激导致了“功能让渡”现象。

上文回顾了德国政党智库“吃皇粮”的简要历史，揭示了德国政党创立政党智库，以及公共资金资助政党智库的初始原因：让政党智库承担起政治教育使命。

3 使命问题：“以政治教育为核心使命”的文本证据

使命问题是“元问题”。前面，我们侧面、分散、间接地涉及了该问题。下面，我们将正面、集中、直接地回答该问题。

3.1 德国政党智库自己怎么说？

在德国各大联邦级政党智库的官方网站上，我们都可以轻易地找到对其使命的介绍。兹录如下。

表1 德国政党智库对自身使命的介绍

Table 1 German partisan think tanks’ introduction to their missions

艾伯特基金会

文本	（1）艾伯特基金会中国办公室网站主页：“本着社会民主的精神，基金会通过全民教育、研究和国际合作，致力于促进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2）艾伯特基金会德文网站捐赠传单：“艾伯特基金会主要通过以下方式促进社会民主：通过政治教育工作加强公民社会；政策咨询；通过遍布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处开展国际合作；促进资优人才；建立档案、图书馆，以保存对社会民主的共同记忆。”（3）该德文网站《关于艾伯特基金会》网页：“艾伯特基金会的中心任务是政治教育和咨询。”
结论	在艾伯特基金会从事的诸多工作中，政治教育被置于首要地位。

阿登纳基金会

文本	（1）阿登纳基金会网站主页：“阿登纳基金会通过政治教育在国内外促进和平、自由和公正。”（2）该网站英文版《关于我们》网页：“向广大公众提供政治教育是我们的关键胜任力之一。”（3）该网站《阿登纳基金会政治教育的意义和概况》网页：对于阿登纳基金会来说，政治教育是其核

这种让渡只是部分的、相对的让渡。

	心业务之一——这在国内外都适用。
结论	政治教育是阿登纳基金会的核心业务之一。

瑙曼基金会

文本	（1）瑙曼基金会英文网站主页：“基于自由主义原则，瑙曼基金会在德国和国外提供政治教育。”（2）该英文网站《基金会的使命》网页：瑙曼基金会以“兴趣必须形成：政治教育”“经验不可替代但可交流：政治对话”“共同寻找解决方案：政策建议”“投资未来：给优秀学生的奖学金”“供将来参考的自由主义：档案”为自己的使命。（3）最新版本的《年度报告》：“瑙曼基金会以自由主义为基础，在德国和国外提供广泛的政治教育。”
结论	瑙曼基金会以自由主义为基础，在国内外提供政治教育。

赛德尔基金会

文本	（1）赛德尔基金会中文网站《关于我们——汉斯·赛德尔基金会的使命》网页：“‘为民主、和平与发展服务’是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任务与使命的宗旨。不管是在德国，尤其是巴伐利亚州，还是在全球，都以此作为工作的行为准则。每一代人都须重新努力理解民主。尤其是年轻人必须了解清楚社会政策相关问题，才能有志亲自参与其中并承担起责任。简言之：民主需要公民教育。”（2）赛德尔基金会德文网站《关于我们》网页：“赛德尔基金会的使命是通过政治教育加强民主。”（3）该德文网站《20 世纪 60 年代：创建与发展》网页：1965 年底，基社盟委托弗里茨·皮尔克（Fritz Pirkl）博士成立注册协会，明确“今后应以赛德尔基金会的名义开展基于基督教社会价值观的政治教育工作”。
结论	从成立伊始，赛德尔基金会的使命就是通过政治教育加强民主。

伯尔基金会

文本	（1）伯尔基金会英文网站《我们是谁，我们想要什么》网页：“基金会的首要任务是在德国和国外的政治教育，以促进民主意愿、社会政治参与和国际理解。”（2）《章程》“第 2 条　协会宗旨”中，第 1 款指出“该基金会的优先事项是在国内外开展政治教育工作，以促进民主决策、社会政治参与和国际理解。”（3）《2020 年度报告》：“该基金会的首要目标是支持国内外的政治教育，从而促进民主参与、社会政治运动和跨文化理解。”
结论	伯尔基金会的首要任务是在国内外开展政治教育。

卢森堡基金会

文本	（1）卢森堡基金会网站《基金会》网页：“卢森堡基金会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提供者之一。”（2）该网站《谁是卢森堡基金会？》网页：“卢森堡基金会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个亲政党的政治基金会，也是一个社会政治成人教育的经纪人。”（3）《2021 年度报告》：“卢森堡基金会的任务是为所有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致力于民主社会主义

	的人提供广泛的政治教育。”
结论	卢森堡基金会的任务是提供政治教育。

伊拉斯谟基金会

文本	（1）伊拉斯谟基金会网站主页：“我们是德国最年轻的政治基金会，在意识形态上亲近选择党。……我们致力于促进民主治理和提供公民教育。”（2）该网站《我们的使命》网页列举了伊拉斯谟基金会的3大使命，其中第1项使命是“我们的任务是通过提供公民教育来帮助建立清晰度和透明度”。（3）该网站《教育工作坊》网页：“公民教育是我们的核心关切。”
结论	政治教育是伊拉斯谟基金会的核心关切。

以上是德国7家联邦级政党智库的“自白”。幸运的是，在聆听这些“独白”之后，我们还可以享受几曲“合唱”。

表2　德国政党智库、政党对政党智库使命的共识

Table 2 German partisan think tanks and German political parties' introduction to the missions of German partisan think tanks

1998年《联合声明》	1998年11月，阿登纳基金会、艾伯特基金会、瑙曼基金会、赛德尔基金会和伯尔基金会等5家政党智库发表了《关于国家资助的政治基金会的联合声明》。2003年，卢森堡基金会也批准了该《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列举了各大政治基金会在国内外开展的社会政治和民主教育工作、信息和政策咨询应特别针对的7大目标。其中，位列第一的目标是：“通过提供政治教育激励公民参与政治问题，促进和深化他们的政治参与。”
2011年立场文件	2011年7月12日，阿登纳基金会、艾伯特基金会、瑙曼基金会、伯尔基金会、赛德尔基金会、卢森堡基金会等6家政党智库的主席共同向德国联邦内政部长提交了一份名为《德国政治基金会的教育工作》的立场文件。该立场文件明确指出：“政治基金会由国家授权开展民主和社会政治教育工作。根据联邦宪法法院1986年7月14日的裁决，这项任务符合公共利益，因此由公共资金资助。”
2021年《联合执政协议》	2021年11月24日，社民党、自民党、绿党等3党组成的“交通灯联盟”公布《联合执政协议》，其中指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政治教育和促进民主，因为在德国，多元化的自由民主也面临着压力。今后，在尊重、宽容、尊严和人权的基础上开展工作的可持续地促进民主的行为者将继续得到公共资金的支持。我们希望为政治基金会的工作和融资提供更好的法律保护。”

静静聆听，深深感悟，我们认为，无论是“独白”还是“合唱”，其“最强音”都是：“德国政党智库：以政治教育为核心使命”。

尽管如此，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现代西方政治充斥着道德说教，这些说教往往宏大美丽而空洞无物，令人心旷神怡却又心智迷乱。有鉴于此，我们不能

只听信德国政党智库的一面之辞，还应该听听其他方面的声音。

3.2 外界对德国政党智库的认知

多年来，外界高度肯定德国政党智库及其政治教育工作。兹录如下。

表 3 外界对德国政党智库及其使命的认知

Table 3 External evaluation of German partisan think tanks and their missions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	由于德国政党被称为“纲领政党”，德国政党智库也普遍“照章（程）办事”，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 1986 年 7 月 14 日的著名裁决中，该院将章程作为评判各政治基金会的基本依据。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指出各基金会为了实现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任务，大致相同地开展政治教育工作、科学研究，促进资优人才，并致力于国际合作。他们维护档案和图书馆，出版工作材料和著作，并提供会议设施。根据其章程，各基金会在法律上和组织上独立于各政党。根据其章程规定的宗旨，各基金会促进政治教育：本着民主精神（艾伯特基金会）；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瑙曼基金会）；在基督教民主的基础上（阿登纳基金会）；在基督教的基础上（赛德尔基金会）。
德国总统	德国前总统罗曼·赫尔佐克（Roman Herzog）将“民主教育”视为“政治基金会的永久的、实际的任务”，认为其有助于“开放社会的公民可以尽可能有知识地参与民主的发展进程”。
德国联邦内政部	德国联邦内政部网站《政治基金会》网页肯定政治基金会是“社会和民主教育工作的重要杠杆”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知名专家学者	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政治学研究所荣休教授海因里希·佩勒（Heinrich Pehle）指出，《基本法》第 21 条赋予政党参与人民政治意愿形成的职能。然而，由政党决定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完成这项任务在实践中，政治教育工作是由“亲政党的”基金会进行的。国家支持这些基金会的活动，通过联邦预算的资金，使这些活动除了政治教育工作以外，还扩展到政策咨询、促进资优人才和国际合作等。
维基百科	德文维基百科“亲政党的基金会（德国）”词条指出：“亲政党的基金会是以政治教育为宗旨的与德国政党关系密切的机构，他们出于法律原因与政党分离。……亲政党的基金会的官方任务主要是对国内外的民众进行政治教育，促进资优人才，以及发展合作。”

应该说，外界对亲政党的基金会的认知高度一致，都认为其核心使命是政治教育工作。

大巧不工，重剑无锋。通过寻章摘句，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文本证据来论证本文的核心观点：“德国政党智库：以政治教育为核心使命”。这些文本证据兼顾相关性、权威性、广泛性和时效性，很好地证明了我们的观点。

考虑到文化和语言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以及为了避免对学术问题的严肃探讨沦为文字游戏，我们将本文的核心观点在中华文化场域和中文语境中表述如下：政治教育是德国政党智库的首要/核心/主要/最重要/最突出的宗旨/使命/任务/工作/职责。“德国政党智库：以政治教育为核心使命”这一论断，是该观点的简明表述。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国外研究资料特别是德文资料，对德国政党智库的使命问题作了一番追根溯源似的探索。在对德国政党智库概况的描述中，我们呈现了政党智库与政治教育渊源颇深，以及一些政党智库的前身是政治教育机构的事实。和大多数中国学者不同，我们通盘考虑德国政党和政党智库的资金问题，深入考察了德国政党和政党智库“吃皇粮”的历史，介绍了发生在德国政党和政党智库之间的“功能让渡”现象，揭示了德国政党创立政党智库，以及公共资金资助政党智库的初始原因：让政党智库承担起政治教育使命。最后，我们出具了德国政党智库、德国政党、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德国总统、德国联邦内政部、知名专家学者等的书面“证词”，这些书面“证词”都有力地支撑了我们的观点：政治教育是德国政党智库的核心使命。总之，不同于以政策咨询见长的美国智库，德国政党智库以政治教育为核心使命。他们是 20、21 世纪的“传教士”，孜孜不倦地在全球各地传播西方特别是德国的政治话语。他们弘宣的核心“教义”是西方民主。

毋庸讳言，本文的观点会引发争议：毕竟，在我国，一提到“智库”，人们就会想到“决策咨询”。然而，如果本文的观点是可取的，那么我们可能需要走出传统观念的藩篱。未来，一方面，中国智库要选准“主攻方向”。具体来说，中国智库要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废其不欲不能，切实扬长避短，在政策咨询、公共外交、政治教育等功能中确定一个或多个主攻方向。其后，理想的情况是：经过多年的专业化、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中国智库的全球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幅提升，在国际舞台上或以政策咨询见长，或以公共外交称雄，或以政治教育闻名，等等。另一方面，中国智库要拓展“战略空间”。当前，我国有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交叉学科等 14 个学科门类。显然，从传统的智库观念出发，一些学科门类天然地亲近智库，易于发挥智库功能特别是政策咨询功能，另一些学科门类则不然。但是，如果我们更新观念，打开视野，不把目光局限于政策咨询一隅，那么一些原本被认为“亲智（库）性”弱的学科门类就可能焕发活力，为中国智库提供更多、更大、更好的发展空间。这值得一试。

参考文献：

例如，德中两国政治教育的内涵不同。尤其是，在德国，政治基金会将艺术和文化作为其政治教育工作的一部分。

[1] Friedrich-Ebert-Stiftung. Geschichte der Friedrich-Ebert-Stiftung e.V.[EB/OL].[2022-05-17]. https://www.fes.de/?id=233.
[2] Konrad-Adenauer-Stiftung. Geschichte[EB/OL].[2022-05-18]. https://www.kas.de/de/geschichte.
[3] Konrad-Adenauer-Stiftung. About Us[EB/OL].[2022-05-18]. https://www.kas.de/en/about-us.
[4] Friedrich Naumann Foundation for Freedom. Our namesake[EB/OL].[2022-05-19]. https://www.freiheit.org/germany/our-namesake.
[5] Hanns-Seidel-Stiftung. Hanns Seidel[EB/OL].[2022-05-19]. https://www.hss.de/ueber-uns/hanns-seidel/.
[6] Hanns-Seidel-Stiftung. Geschichte der Hanns-Seidel-Stiftung[EB/OL].[2022-05-19]. https://www.hss.de/ueber-uns/geschichte/.
[7] 汉斯·赛德尔基金会. 在华工作[EB/OL]. [2022-05-19]. https://china.hss.de/zh/在华工作/.
Hanns-Seidel-Stiftung. Our work in China[EB/OL]. [2022-05-19]. https://china.hss.de/zh/在华工作/.
[8] 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德国）北京代表处. 海因里希·伯尔（1917-1985）[EB/OL]. [2022-05-21]. https://cn.boell.org/cn/hai-yin-li-xi-bo-er.
Heinrich-Böll-Stiftung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Heinrich Böll（1917-1985）[EB/OL]. [2022-05-21]. https://cn.boell.org/cn/hai-yin-li-xi-bo-er.
[9] 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德国）北京代表处. 关于我们[EB/OL]. [2022-05-21]. https://cn.boell.org/cn/wo-men-shi-shui.
Heinrich-Böll-Stiftung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About Us[EB/OL]. [2022-05-21]. https://cn.boell.org/cn/wo-men-shi-shui.
[10] Heinrich-Böll-Stiftung. Zur Geschichte der Heinrich-Böll-Stiftung[EB/OL].[2022-06-17]. https://www.boell.de/de/geschichte-der-stiftung.
[11] Heinrich-Böll-Stiftung. Verpflichtung zu Transparenz: Die Heinrich-Böll-Stiftung auf einen Blick[EB/OL].[2022-06-15]. https://www.boell.de/de/stiftung-leitbild-initiative-transparente-zivilgesellschaft.
[12] Rosa-Luxemburg-Stiftung. Wer ist die Rosa-Luxemburg-Stiftung?[EB/OL].[2022-05-22]. https://www.rosalux.de/publikation/id/43336/wer-ist-die-rosa-luxemburg-stiftung.
[13] SCHÜTRUMPF J, WITTICH E. Eine polarisierende Person[EB/OL].[2022-05-22]. https://www.rosalux.de/publikation/id/39683/eine-polarisierende-person.
[14] Desiderius-Erasmus-Stiftung. Darum haben wir unsere Stiftung nach Desiderius Erasmus benannt[EB/OL].[2022-06-30]. https://erasmus-stiftung.de/erasmus-von-rotterdam/.
[15] STEFFEN T. AfD will mit Stiftung an Steuergeld[EB/OL].(2017-01-06)[2022-07-04]. https://www.zeit.de/politik/deutschland/2017-01/afd-parteistiftung-geld-zuschuesse-staat-konrad-adam.
[16] Desiderius-Erasmus-Stiftung. Die Desiderius-Erasmus-Stiftung e.V. wurde anerkannt[EB/OL].[2022-06-30]. https://erasmus-stiftung.de/die-desiderius-erasmus-stiftung-e-v-wurde-anerkannt/.
[17] 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 State Level Foundations[EB/OL].[2022-05-21]. https://www.boell.de/en/state-level-foundations.
[18] MASSING P. Politische Stiftungen[EB/OL].(2015-03-19)[2022-05-25]. https://www.bpb.de/lernen/politische-bildung/193401/politische-stiftungen/?p=all.
[19] Wikipedia. Parteinahe Stiftung (Deutschland) [EB/OL].[2022-06-30]. https://de.wikipedia.org/wiki/Parteinahe_Stiftung_(Deutschland).
[20] CARR E H.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21] BOSEN R. Friedrich Ebert at 150: Germany's pioneer of democracy[EB/OL]. (2021-02-04)[2022-07-15]. https://www.dw.com/en/friedrich-ebert-at-150-germanys-pioneer-of-democracy/a-56447749.
[22] Friedrich-Ebert-Stiftung. Friedrich Ebert (1871-1925) [EB/OL].[2022-07-15]. https://syria.fes.de/about/friedrich-ebert.
[23] BRAUN B. Wie alles began: 80 Jahr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 Eine Außenansicht[EB/OL].//Friedrich-Ebert-Stiftung. 80 Jahr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2005-03-08)[2022-07-17]. https://library.fes.de/pdf-files/fes/03890.pdf.
[24] （德）苏姗·米勒,海因里希·波特霍夫. 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M]. 刘敬钦,李进军,解健真,等译. 北京: 求实出版社, 1984: 122、123、124、125、131、139、140、326.
MILLER S, POTTHOFF H. A Small History of the SPD[M]. LIU J Q, LI J J, XIE J Z, et al. translated. Beijing: Qiushi Publishing House, 1984: 122、123、124、125、131、139、140、326.
[25] （法）乔治·埃斯蒂厄弗纳尔.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党[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50、55、56、60、61、82.
ESTIEVENART G.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6: 50、55、56、60、61、82.
[26] KRÜGER T. Aufarbeitung von Diktaturen in Argentinien und in Deutschland: Vergleichende Überlegungen und Schlussfolgerungen für die politische Bildung [EB/OL].(2006-08-30)[2022-06-26]. https://www.bpb.de/die-bpb/presse/51159/aufarbeitung-von-diktaturen-in-argentinien-und-in-deutschland/.
[27] Die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Gründung und Aufbau 1952-1961[EB/OL].(2011-07-10)[2022-06-27]. https://www.bpb.de/die-bpb/ueber-uns/geschichte-der-bpb/36421/gruendung-und-aufbau-1952-1961/.
[28] DUSCHINSKY M P. The Party Foundations and Political Finance in Germany[M].// SEIDLE F L. Comparative Issues in Party and Election Finance: Volume 4 of the Research Studies. Toronto: Dundurn Press, 1991. 182 、183、185、187.
[29] DUSCHINSKY M P. Foreign Political Aid: The German Political Foundations and Their US Counterparts[J].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1, 67(1): 33-63.
[30] 德国联邦议院.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M]//张文红. 世界主要政党规章制度文献. 德国.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 3-68.
German Bundestag. Basic Law for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M]//ZHANG W H. Documents on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World. Germany.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16: 3-68.
[31] （德）埃弗哈德·霍尔特曼. 德国政党国家：解释、发展与表现形式[M]. 程迈,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 173、190.
HOLTMANN E. The Party State in Germany: Explanations, Developments, Appearances[M]. CHENG M, translated.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 2015: 173、190.
[32] Deutscher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BVerfGE 8, 51 - 1. Parteispenden-Urteil[EB/OL].(1958-06-24)[2022-08-05]. https://www.servat.unibe.ch/dfr/bv008051.html.
[33] Deutscher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BVerfGE 20, 56 - Parteienfinanzierung I[EB/OL].(1966-07-19)[2022-08-06]. https://www.servat.unibe.ch/dfr/bv020056.html.
[34] PUTNAM R D.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88, 42(3): 427-460.
[35] NIETAN D, WETTIG K. 50 Jahre Parteiengesetz: Der Weg zu Fairness und Transparenz[EB/OL].(2017-06-28)[2022-06-25]. https://www.vorwaerts.de/artikel/50-jahre-parteiengesetz-weg-fairness-transparenz.
[36] Deutscher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BVerfGE 73, 1 - Politische Stiftungen[EB/OL].(1986-07-14)[2022-08-07]. https://www.servat.unibe.ch/dfr/bv073001.html.
[37] Deutscher Bundesregierung. Antwort （Parteinahe Stiftungen） [EB/OL]. (2018-01-23)[2022-08-23]. https://dserver.bundestag.de/btd/19/005/1900503.pdf.